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实现经济增长可以靠增加投入、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以降低消耗和成本四种途径来实现，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上述四种办法并存，共同发挥作用，而根据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哪种办法来实现，则可以将其划分为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或者称为粗放性型增长和效益型增长。前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实现的，如工业化过程中依靠增加投资（包括人力）新建和扩大企业规模和第二产业的扩张为主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后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消耗和成本实现的，如后工业化国家主要不是依靠第二、三产业的企业和产品数量扩张，而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经济增长，当然，这种经济增长也包含着大量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其产出则表现为单位物质消耗的降低和单位产品价值的提高。

中国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 56 年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人均收入低下的发展中大国，加上此时的世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中国不可能再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时可以充分依靠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积累有限、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贫困中起步。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大量人口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面临着资本、自然资源、环境和市场的多重压力。并且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和具有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抱负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担负起 100 多年来受到严重阻碍的工业化重任。但是从 1953 年我国完成战后的经济恢复，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资源严重缺乏就开始困扰着中国共产党。资本的严重不足一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而人口众多，积累非常有限（1949 年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甚至断言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二是人力资本也非常有限，大量的劳动力是文盲，科技人员和具有专业技术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而资源的不足，一是表现在人均耕地的严重不足，同时也严重缺乏可以用来出口换汇的木材、石油、矿石等。在这种情况下，同时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大国的统一和安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重工业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苏联率先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了把有限的资源和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从 1953 年起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底即确立了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增加投入，传统产业农业就不用说了，人力的使用大大超过了过去，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二是依靠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高的第二产业的外延型扩张，即产业结构的变动；三是依靠技术进步，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新工业部门的建立。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失误和缺乏激励机制，其表现就是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浪费现象。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经试图通过权力下放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即“全党大办工业”、“全民大办工业”、“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来加速工业化和消除官僚主义，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依靠行政命令方式推行的经济建设运动被“大跃进”的失败而证明行不通，此后在经济体制复归的条件下，毛泽东又将问题提高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试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结果是南辕北辙，距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背道而驰，越来越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以及计划管理和市场调控的此消彼长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单纯政府推动转变为政府和人民双重推动，人民群众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在政府一旦松绑以后，立即爆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靠制度变革产生的体制效益推动，二是政府继续大规模的投入；三是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的个体经济）和引进外资。

上述动力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就是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并驾齐驱，共同推动了中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种以加快发展和致富为第一目标，一方面，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成长，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都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内涵的性质；另一方面，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能耗高、污染大、规模不经济的企业数量上猛烈膨胀，并形成过度竞争；因部门和地区利益导致的国家投资重复建设、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降低资源价格和环保门槛，导致了增加企业数量和工业的外延型扩张成为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种外延型的扩张，在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压力下，还必然要持续一个阶段，或者说直到工业化完成。

二、从“增产节约”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说，由于积累率低、资本稀缺和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之日起就重视经济效益问题，只不过其表现方式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例如当1951年国有企业的产权清理和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为了提高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首先在工业基地东北开展并被毛泽东推广到全国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工作中的浪费和管理问题。此后，在全国各行业推广的“马恒昌小组”、“郝建秀工作法”、“倪志福钻头”等，以及几乎每隔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增产节约”运动，都反映出在那种供给约束型（又称资源约束型）经济体制下，必然要强调降低成本、节约资源。这也体现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单一公有制下，在宏观经济方面，由于信息不充分和领导随意性导致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波动；在微观经济方面，因缺乏自主和激励机制而导致的低效，使得“好”和“省”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一）80年代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在初期的拨乱反正时，就强调要扭转“文革”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1979年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提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80年代初实际上已经提出。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十条方针，可以说是重视和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以后中央也多次提出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例如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即提出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随后在同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提出：“‘六五’计划要求，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5年，针对“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技术管理，严明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健全检查制度、监督制度，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一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0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又一次专门提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90年代提出两个“根本转变”。



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中国掀起了新一轮追求高速度发展浪潮，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十四大仍然提出：“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认真抓好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9月，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时专门讲到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2]

上述思想体现在当时制订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实现今后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经济体制转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每年新增加的投入相当可观，但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领域，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3]

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重申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江泽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上提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要彻底转变传统的计划投资方式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把调整经济结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4]

（三）新世纪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对建国5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和对世界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以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完成了关于工业化认识上的转变。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式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分析我国“十一五”时期面



临的国内外环境时，认为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一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进而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5]200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一次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重要性和提出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6]

三、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应该说，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但是，尽管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要将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并且20多年来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对其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地升级，但是20多年来经济效益虽然有明显提高，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十五”计划期间，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认识更进一步，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更突出，但是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却不断上升。[7]

仅仅从单位GDP的能耗看，我国在20多年里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不能适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和环境脆弱的国情。

中国与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比较

	中国大陆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韩国
1990	2.1	3.7	6.4	4.9	5.5	5.5	4.3
2002	4.6	4.4	6.4	6.2	5.8	6.6	3.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158-16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明显？其主要制约因素究竟是什么？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看来应该从客观上寻找阻碍转变的因素。这里试图从三个方面看制约经济增长转变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外延型增长仍然有较大空间。工业化中期的需求升级和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重化工业的扩张。

中国13亿人口的60%还生活在农村，还处于低收入和渴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这个客观条件，必然决



定中国经济的外延型扩张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强烈的需求。在工业化起飞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在大量人口需要转移和就业的压力下,扩大经济总量和增加就业机会,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愿望,更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在今天,当民营经济已经大大超过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杠杆的条件下,更加充分显示出我国的经济扩张是一个客观规律和要求。再以外延型发展很快并遭到诟病最多的煤炭生产来看,是需求决定了供给,当政府提高煤炭生产的安全门槛后,立刻就表现出煤炭价格上涨和许多农村居民又转向砍柴取暖,因为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亦即能耗的增加。[8]下面再提供能源消耗和城市建设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来说明中国外延型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中国和世界人均能源和电力使用情况

国别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2年	
	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	人均发电量(千瓦小时)	人均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	人均用电量(千瓦小时)	人均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	人均用电量(千瓦小时)	人均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	人均用电量(千瓦小时)
中国大陆	604	306	775	424	905	827	960	987
中国香港	1079	2520	1869	4178	2319	5447	2413	5612
世界	1627	1846	1686	1746	1694	2176	1699	2225
低收入国家	442	340	449	189	569	352	493	312
中等收入国家	1246	1098	993	820	1318	1391	1338	1422
高收入国家	4796	6845	4850	7051	5430	8617	5395	8693

说明:中国大陆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世界银行:《2005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002年中国与世界交通、电力、通讯及电视人均拥有情况

国别	机动车每千人拥有量	轿车每千人拥有量	电话主线每千人拥有量①	电视机每千人拥有量
中国大陆	12	7	209	350
中国香港	77	57	559	504
世界	135	105	183	275
低收入国家	---	---	32	84
中等收入国家	56	42	178	280
高收入国家	601	436	560	735

①电话主线每千人拥有量、电视机每千人拥有量为2003年的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再看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水平比起分散居住在乡村将有较大提高，它必然导致社会在住房、道路、交通通讯、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这里还不包括第三产业的投资。“九五”以来的10年里，我国的城市公用设施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下表所示，但即使这样高速增长的增长，仍然没有达到国际水平。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国际水平为10-15%；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的国际水平为3-4%，联合国推荐水平为3-5%。[9]

年份	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总量 (亿元)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	占GDP的比重(%)
1952-1980	134.24	1.47	0.24
“六五”时期	180.99	2.30	0.56
“七五”时期	511.75	2.50	0.71
“八五”时期	2449.56	3.80	1.30
“九五”时期	7050.38	5.10	1.80
2001年	2351.91	6.37	2.45
2002年	3123.23	7.23	3.05

资料来源：（1）转引自张伟：《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二) 受长期形成的赶超战略和就业压力的影响, 经济发展速度成为最主要和优先的目标。如前所述, 自建国以来,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参数, 也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华民族奋斗目标, 这都反映和代表了中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 实现赶超, 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和大国地位出发, 就需要降低工业化的成本, 即人为地压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价格来加快工业的发展, 如以国家控制土地和水、森林、矿产等压低自然资源价格, 以剪刀差压低农副产品价格, 以国家垄断金融和规定信贷利息来压低资本价格, 以户籍制来限制劳动力价格。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低价工业化”, 在改革开放以后被相当程度地延续下来, 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 在放开所有制和计划管理的限制后, 却继续控制和实行了自然资源的低价政策(包括对污染环境企业的处罚力度很小), 政府垄断的低成本、低风险的信贷和上市公司; 人为或利用市场的供求来压低职工工资, 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和劳动保障。这些政策对于吸引外资、刺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这种低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筹集, 一是必然导致大量的技术水平低、规模小、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小型企业层出不穷; 二是导致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低、自然资源价格低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迅速发展,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 三是导致大型的企业, 即使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在权衡得失后, 也不会走以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的效益型道路, 而是走资本、规模和人员扩张的外延发展道路; 四是政府利用而不是缓解这种因隐性失业人口太多导致的就业过度竞争、被雇佣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待遇过低现状, 来实现强制储蓄, 结果导致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从而导致职工的素质降低、责任心下降和管理粗放。

(三) 地区之间因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所导致的剧烈竞争, 也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除了港、澳、台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 大陆沿海与内地、以及东、中、西各经济带内部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众所周知, 这种在国内统一市场条件下的地区之间差距, 不仅仅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和面子问题, 更重要的是先发展或快发展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先发之利”, 先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在“低价工业化”的体制下, 会利用它的优势将周边地区的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源吸纳过来, 而将其沦为产品市场、原料产地, 从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因此, 即使出于地方利益和发展的要求, 也必然会导致各地之间在发展速度、基础设施以及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上的激烈竞争。各省都争先恐后, 想“大干快上”, 成为建国以来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 特别是在中央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的时期更是如此。例如这次制订“十一五”计划时, 全国的 GDP 增长指标定位为 7?5%, 而 25 个省市自治区中定位在 8?5%的为 1 个, 9%的为 7 个, 10%的为 10 个, 11%的为 3 个, 12%的为 3 个, 13%的为 1 个, 平均都在 10 以上。[10]

四、几点想法

首先, 应该肯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不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主观上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提高, 而且我国的经济效益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的, 尽管不尽人意。



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能源产生的 GDP，1980 年中国大陆为 0.8，世界总体水平为 2.1，高收入国家为 2.2；而到 2002 年，中国则达到 4.6，等同于世界总体水平，仅比高收入国家低 0.6 个百分点。[11]

第二，外延型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必然现象，尤其是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当技术和资本瓶颈被突破后，伴随着大量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加速，经济规模的剧烈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更是必要的。因此，当改革开放打破了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就出现了长达 27 年的 GDP 年均增长 9.6% 的高速增长阶段。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平衡状态以及就业压力看，三个因素不容忽视：（1）鉴于我国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渴望发展、大量的富裕劳动力亟待转移和城市化加速，中西部地区和广大的乡村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中国经济的外延型发展还会持续一个时期。（2）就我国的大部分工业企业来说，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资本有机构成低和创新能力差的现状是不可能很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的。（3）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一般劳动者过剩，而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严重不足，这种人力资本的积蓄，特别是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是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的。因此，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人均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脆弱，的确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最大因素。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历史看，经济和人口大国工业化的实现，除原苏联的特殊历史条件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仅靠国内市场和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我国尽管提出两个“利用”的基本政策，但是这种可以利用的份额都不够支撑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重新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再从国内的资源和环境的角度看，即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但是土地、环境、水、基础设施等可利用空间也越来越小，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压力几乎接近极限，即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并不能改善甚至恶化生活质量。如果我们不能在已经到来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加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有可能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落空。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有赖于深化改革，必须建立保证科学发展观得以贯彻实施的长效机制。在我国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同步进行的，是在巨大就业压力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条件下进行的，尤其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所作为。相反，加快政府发展观念和经济职能的转变，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条件。党和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她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系统，深化制度和政策改革，例如：（1）适当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用价格杠杆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消耗和污染。（2）推进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市场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让生产要素流向高效企业，淘汰效益低企业。（3）加大保护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通过国家投资和保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纠正劳动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认识误区。（4）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必须有效遏止“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先污染后治理”的得不偿失行为。（5）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资源型和特大型企业的改



革，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龙头企业，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以上这些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1249-125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1996年3月5日。以上所引文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电子读物《中共中央文献库》，1998。

[4]江泽民：《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1997年12月9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第7页。

[5]《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

[6]参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人民日报》2006年2月23日。

[7]参见张卓元：《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8]参见丁双喜：《煤价上涨，贵州农民被迫上山砍柴》，《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14日。

[9]转引自张伟：《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房维中：“十一五”的宏观调控应从“十五”中吸取教训》，《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12日。

[11]参见世界银行：《2001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005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